

基于语料库的“弄”字句及物性研究^{*}

[美] 洛杉矶加州大学 胡骏飞 陶红印

提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分属三种语体(会话口语、影视口语及书面语体)的四个语料库,对由动词“弄”构成的结构的实际用法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研究。结果发现,在语料中低度及物结构多于高度及物结构。我们用及物结构和和谐律对此进行了解释。主要结论是:对动词和相关的句法语义现象的研究不能只限于典型的论元结构的描写,还需要借助语体和语料库进行全面考察,并从语用功能的角度加以解释。

关键词:“弄”、及物性、主观性、语体、语料库

[中图分类号] H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2017)01-0064-09

1. 引言

“弄”是汉语中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动词,使用范围也较广,值得深入探讨。根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语言研究所 1986)的统计,“弄”在被调查的八千词中居第 319 位。由于其常被用来代替一些具体意义的动作,学界一般将它定性为“虚义动词”或“泛义动词”(刁晏斌 2004;铁艳凤 2010)。但此二者都未能指出“弄”的全部特征:“虚义”仅指出了“弄”在脱离语境时词汇意义空虚的特点;而“泛义”则只强调了“弄”的语义适用范围从古至今在不断扩大的特点,如商周时期,“弄”仅指“把玩(玉器等)”,到现代汉语,“弄”已可指代多种动作行为。另有研究者(Lin 2014;朱行帆 2005)立足形式句法,称“弄”为显性轻动词(overt light verb),表达模糊的致使义,使名词或形容词获得支配论元的能力。至于“弄”的句法特征,目前一般提到的类型大致有两种:

^{*} 肖忠华先生生前建立了多个重要语料库并从语体等方面对汉语和英语做出过精辟的研究,本文直接受惠于肖先生生前所收集的汉语语料及研究成果,谨以此文纪念肖先生。本文第二作者感谢洛杉矶加州大学教师研究项目、美国教育部研究项目的资助(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Grant to the Center for Advanced Language Proficienc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FDA 84.229A, P229A100012)),并感谢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在写作期间提供的优良研究环境。

1)“弄”在句中可以做谓语,后接体词性宾语或补语;2)“弄”在篇章中可以替代处置性较强的及物动词。总之,当前对于“弄”的普遍看法是它是一个及物动词,或者说是一个及物性很高的动作动词。本文的考察将基于多种类型的语料库,试图用功能语言学的观点解释语料库中发现的结构现象。具体来说,本文将利用功能语法学中的及物性假说(Hopper & Thompson 1980)考察“弄”的有关用法,将其分为高度及物性和低度及物性两类,并从语用功能的角度对语料库中的发现加以解释。

2. 语料与方法

2.1 语料

本文选用四个语料库作为不同语体的代表进行考察。自然口语语料使用美国宾州大学语料共建会(Linguistic Data Consortium, LDC)所建的汉语电话谈话语料库 CallFriend(简称“电话口语”)。这个语料库有120通电话会话,共约31万词。影视口语语料为电视剧《我爱我家》的脚本转写,共约38万词(简称“影视口语”)。这种语料以剧本台词为本,但又融合了演员的即兴发挥,可以说是经过加工的口语。书面语语体的语料来自两个语料库:一个是McEnery和肖忠华创建的兰卡斯特现代汉语语料库(Lancaster Corpus of Mandarin Chinese),另一个是陶红印和肖忠华共建的洛杉矶加州大学汉语书面语语料库(The UCLA Written Chinese Corpus),这两个语料库的设计原则类似,都包括新闻报道、小说、学术文章、幽默笑话等15个文体,共约212万词(简称“书面语体”)。四个语料库加起来约281万词。

2.2 考察对象

在上述四个语料库中我们共收集到497条有关动词“弄”的有效语料。所收语料排除了三种情况:1)因修复造成的重复,如“你说弄弄弄弄到四兆是吧?”,此种情况只算一条语料;2)古汉语成分,如“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3)在合成词和成语类语汇中充当语素的“弄”,如“摆弄、玩弄、戏弄、捉弄、搔首弄姿、含饴弄孙”等。这类词中的“弄”与其他成分结合成一个语词单位,共同发挥句法作用,所以暂不在考察范围之内。497条有关动词“弄”的语料分布如下:

表 1. “弄”在各语体语料中的分布

语体	语料库	频率	常态频率(以百万词计)
自然口语	31 万	167	538
影视口语	38 万	163	428
书面语体	212 万	167	78

表 1 显示,“弄”在自然口语、影视口语和书面语中出现频率的比例大约为 7:5:1。显然两类口语中的用法远远超出书面语的用法,这个特点下面将进一步加以阐述。

2.3 及物性与句法结构类

在语料中,我们发现常见与“弄”有关的句法格式可根据其及物性程度的高低以及是否带补语结构而加以系统区分。由于补语结构的复杂性,下文的统计和讨论暂排除带补语的结构。关于及物性的程度,我们沿用 Hopper & Thompson (1980) 的经典论述,把及物性看成是一个连续统。Hopper 和 Thompson 的主要做法是根据一组及物性参数(parameters of transitivity)判定小句的及物性程度,并且认为属性相同的相关参数(如高度或低度类)一般在话语中应共现。在本文的研究中,动词论元“参与者(participant)数量”或参与者是否出现被看作是判断及物性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弄”相关的小句中如果有两个或更多的参与者出现,该句即可视为具有高度及物性的句子;相反,如果句中只有一个或没有任何参与者出现,即被看作呈低度及物性。

例(1)-(2)是高度及物性的例句,其中“弄”的施事、受事均出现:

- (1)你们先画着吧,我回屋弄表(报表)去了。(影视)
- (2)他在弄护照呐。(电话)

而例(3)-(5)则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低度及物性特征:例(3)无施事,例(4)无受事,例(5)施受皆无。

- (3)他认为不看大势,只埋头弄船,是危险的。(书面)
- (4)所以说我就没给他弄。(电话)
- (5)去一趟怀柔,来回两个多钟头,怎么弄啊。(电话)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参与者没有出现并不考虑是否能够通过上下文辨认出没有出现的论元成分。这样做的理由是,上下文并不总能决定确切的论元成分。例如:在(6)中,“弄”的施事成分应该可以确认为“张平”,但是(7)中的施事则不一定能够确认,虽然我们大致能够理解其所指对象的范围(“刘连仁”和“大家”)。

- (6)张平还没有回去,现在在弄票。(口语)
- (7)刘连仁对大家说:走到山下弄点吃的,不然会被饥饿折磨死的。(书面)

对单纯不带补语结构(176条)语料的统计表明,低度及物性的用法远远超出高度及物性的用法(比例超过3:1),间接印证了前人有关口语低度及物性的

研究发现 (Tao & Thompson 1994; Tao 1996; Thompson & Hopper 2001)。

表 2. 及物程度在各语体语料中的分布

语体	高度及物	低度及物	合计
自然口语	19	76	95
影视口语	18	41	59
书面语体	5	17	22
合计	42 (24%)	134 (76%)	176 (100%)

另外,在低度及物“弄”字句中,有施无受、有受无施和施受皆无这三种情况分布如下。

表 3. 低度及物结构的类型在各语体语料中的分布

语体	有施无受	有受无施	施受皆无	合计
自然口语	25	26	25	76
影视口语	10	28	3	41
书面语体	1	16	0	17
合计	36 (27%)	70 (52%)	28 (21%)	134 (100%)

统计显示,在所有语料中,有 76% 是低度及物结构 (表 2),其中 21% 的低度及物结构是施受皆无的情况 (表 3),这可以很好地说明低度及物性在真实语料中的常见性。表 3 的数据也对所谓“弄”字常带宾语的论断 (铁艳凤 2010: 17) 给出了更为精确的证据。

3. 及物程度与主观性

通过对论元结构式的考察,我们发现高度与低度及物结构式的差异同主观性的程度有极大关系。

当前关于主观性 (subjectivity) 及主观化 (subjectification) 的研究已经产生出了大量的文献,但是各家所给的定义和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本文并不打算全面展开关于主观性或主观化的理论讨论,而只是根据 Lyons (1981: 240) 的定义,把主观性看作是一种广义的说话人“与自我有关的态度和情感方面的表达和反思”。我们这里也特别强调主观性是一个连续统,而不是说一不二或黑白分明的:人们说话时留下的自我印记越多,或者说投入的主观情感越多,产出的言语的主观性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在操作层面上,本文依据表达功能,将高度及物性和低度及物性的两类结构式 (共 176 条语料) 分别从五个句法语义范畴 (叙

述、建议、评价、问询和意愿表达)进行考察;在每个范畴下再依据与“弄”共同出现的前后词语及“弄”本身的语法特征,将每一条语料进行主观性显著或不显著的区分和标注。这五种范畴和相关判断标准大致描述如下。

1)叙述 指说话人向听话人描述一件过去的或正在发生的事件或动作行为,或者向听话人转述他人的话。话语中的叙述包含两小类:不带情感的叙述和带情感的叙述,分别表示较强客观性和较强主观性倾向。带情感的(亦即主观性较强的)叙述句包含三种类型:a)小句以语气词结尾; b)重叠的“弄”(如“弄弄、弄一弄、弄啊弄”等); c)小句中有语气副词(如“竟然、反正”等),或“弄”前有表示主观态度的修饰成分。例(8)-(9)属于“不带情感的叙述”,其中不带任何明显的主观情感成分。

(8)张平正在弄票。(电话)

(9)他说要我给他弄两份成绩单。(电话)

例(10)-(13)分别带了不同的情感成分,属于有显著主观性的“带情感的叙述”。

(10)弄二十多个人首日封让我签呐。(影视)

(11)我最近帮他们做些事,没什么,弄一弄。(电话)

(12)总归给他弄。(电话)

(13)好不容易弄点钱。(书面)

例(10)在叙述事件结束后加了一个语气词“呐”,传递出说话人激动的心情;(11)中说话人选择重复动词“弄”来表达一种轻松的语气,让听话人感觉自己目前在做的事不值得过分渲染;(12)中小句起始位置的“总归”表达说话人让步的态度;(13)中“好不容易”传达出作者对事实的感慨。

2)建议 包含两小类。一类是有回旋余地的建议,这类建议是说话人基于自身经验对听话人所处境遇或所遇问题提出的意见,听话人可根据自身情况做出决定。另一类是类似命令或要求的无回旋余地的建议。前者判为主观性较强,后者主观性较弱。例(14)属于有回旋余地的建议,是说话人在看到听话人几次签证都没成功后对其进行的劝说。例(15)属于无回旋余地的建议,是一位排长在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情况下对手下士兵所说的话。

(14)这次不行我看你就别弄了。(电话)

(15)走到山下弄点吃的。(书面)

3)评价 指说话人对客观现实的评判。这本身就代表着高度的主观性,因此本文对“评价”功能统辖的全部语料都标记为“主观性显著”。例(16)是说话

人在听完如何撬锁以后,对“撬锁”这一行为进行的主观评价,其中还用了“着呢”这种带有夸张意味的语气词加强了该评价的主观色彩。

(16)难弄着呢那个。(影视)

4)问询 包括三种类型:a)不包含句末语气词或重叠“弄”或语气副词的一般疑问;b)包含句末语气词或重叠“弄”或语气副词的一般疑问;c)设问或反问。第一种主观性不显著,后两种主观性较强。例(17)属于第一种类型,说话人单纯地询问如何处理鱼皮。与此相反,例(18)在句末出现语气词“的呀”,既表示询问,又表达了说话人对于气功大师神奇表演的惊讶之情。例(19)中句首的“难道”标记出说话人强烈的难以置信的主观情感(Jing-Schmidt 2008)。

(17)这个皮怎么弄?(书面)

(18)那电扇怎么弄的呀?(影视)

(19)难道这么短时间我能弄两万块钱?(影视)

5)意愿表达 指说话人通过话语表达自己的意图、愿望等,一般句中会出现“会、想要”等心理或能愿动词。这些自然也带有高度主观性的印记。例如:

(20)我想给我老板弄点中国礼品。(电话)

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将主观性程度的高低与句法成分的对应情况列表如下:

表 4. 主观性显著程度判断标准

范畴	主观性显著	主观性不显著
叙述	带情感叙述;带句末语气词;有重叠“弄”;有语气副词或修饰成分	不带情感的叙述;无句末语气词;无重叠“弄”;无语气副词或修饰成分
建议	有回旋余地的建议	命令式或没有回旋余地的建议
评价	全部	无
问询	包含句末语气词或重叠“弄”或语气副词的一般疑问;设问或反问	不包含句末语气词或重叠“弄”或语气副词的一般疑问
意愿表达	全部	无

根据表 4 的判定指标,我们对所有不带补语结构的“弄”字句的主观性特征进行了标注,结果如表 5 所示。在高度及物结构中,以主观性不显著为主(常态值为 11,而主观显著性的常态值仅为 4)。但是低度及物结构的情况稍显复杂:总的来说,主观性显著的强于主观性不显著的(常态值 29:19)。具体到语体来看则是电话口语和影视口语的分布状况与整体分布状况一致(如主观性显著常态值分别为 155 和 66,远远超过整体语料的 29),书面语体主观性显著与主观性不显著两种状态持平(常态值 4:4)。究其原因,我们可以说书面语缺乏互动,

因此主观性会略低。这与一般认识相符(如 Chafe & Danielewicz 1987; Biber 1988; 陶红印 1999)。但由于书面语体材料例子极少,口语语体例子的数量占绝对多数,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在互动交际中,低度及物格式与高度主观性有较强的对应关系,而高度及物格式则与低度主观性有明显的关联。

表 5. 高度及物与低度及物格式的主观性差异(频率/常态值,常态值以每百万词计数)

语体	高度及物结构		低度及物结构	
	主观性显著	主观性不显著	主观性显著	主观性不显著
电话口语(31 万)	6/19	13/42	48/155	28/90
影视口语(38 万)	5/13	13/34	25/66	16/42
书面语体(212 万)	1/0	4/2	8/4	9/4
总计(281 万)	12/4	30/11	81/29	53/19

电话口语和影视口语在主观性显著方面的一致性可以说有其自然基础。这两类语料从内容上看大都涉及日常生活,形式上多为两人或多人的直接对话,都有一定的互动性。而自然的电话口语在低度及物性和高度主观性方面又进一步超越影视口语,更进一步说明了无准备的自然口语的高度主观性特征(陶红印、刘娅琼 2010a, b),也验证了已有的对汉英会话低度及物性研究的发现(分别参见 Tao 1996; Thompson & Hopper 2001)。

从构成成分上来看,动作参与者没有全部出现与其他方面交际内容的表达构成平衡,包括带情感叙述、有回旋余地的建议、带互动因素的询问、评价、建议等,都属于值得关注的交际要素。

4. 讨论

前面我们从主观性的角度解释了语料库中发现的“弄”字句的结构趋势。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弄”字句的复杂程度主要体现在表达除论元成分外的相关成分方面。从功能语法学的观点看,所有这些现象似乎都可以做出统一的解释,具体来说就是及物属性和谐律。

Hopper & Thompson (1980) 在讨论语句的及物性程度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假说,即及物性除了有程度的区别外,还应该有共变现象 (co-varying),我们把这个现象称之为“及物属性和谐律”。这指的是各类及物性指标同时出现时一般指向共同的方向而不是相反方向,比如及物性高的完成体一般不与及物性较低的延续性和非意志特征共现。我们认为这个假说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弄”字句多呈低度及物性特征。

首先,从动作性质来看,“弄”本身常常表示不具体的动作,甚至表示一个过程。例如:

(21) 人家说,鱼汤对嗓子好,好些演员演出前都喝鱼汤。啊,弄个素菜,别忘了放香菇啊,要不没法儿吃。(影视)

(22) 去一趟怀柔,来回两个多钟头,怎么弄啊。(电话)

(23) 人家别人都说,世界杯还不在欧洲弄呢。(电话)

例(21)中“弄个素菜”看似简单,但也可能包括不少步骤,包括说话人要求的放香菇等。例(22)中“去怀柔来回两个钟头”的“弄”也应该包含句中没有具体说明的诸多动作和过程,而(23)中的“弄”世界杯也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

因此我们可以说,“弄”的基本语义特征为其在话语中的低度及物性伴生现象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是低度及物性的具体表现则是语用因素决定的,因为低度及物性在汉语里有各种表现可能,例如只简单地隐去论元成分,或着重表达一些过程,或表达动作效力低下,等等。所以我们还要在其他方面为其在语料中呈现的多种复杂结构寻找更合理的因素加以解释。

在解释英语会话中呈现出的低度及物特征时,Thompson & Hopper (2001)指出,人们在谈话中倾向于从自身的视角或立场描述客观实在的状态、表达说话人的态度,以及对事态和行为给出个人的评价。而当人们试图表达主观意愿和个人态度时,低度及物性的表达方式就会在话语中成为活跃成分。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当描述事态状态时,一般来说非动作动词或形容词会比较适当,在评价事物和表示个人态度时,形容词性的成分也通常比较适合,这些都是带低度及物(或根本就无所谓及物)特征的语法成分。

上面的讨论也为大量弄“字”句出现在两种类型的口语(尤其是电话口语)中提供了注脚。因为前面已经提到,在即时互动性口语中,人们更关注的是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角度等(Thompson & Hopper 2001)。另外,自然的电话会话一般比较不正式,而喜剧性的电视剧则是对日常口语的模拟再加上一些戏剧化的夸张、幽默,“弄”字句的非庄重的特征非常适合这两种语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体和及物性的低度倾向也是一种可以期待的结果。

5. 结语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不同语体的篇章话语材料为基础,对“弄”字句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考察。我们发现,在话语篇章材料中,“弄”字句具有低度及物性(论元结构简化)的特点。这弥补了传统上把“弄”简单地看作是高度及物动词或虚化、轻动词或从语料库中简单举例等描写方面的不足。我们认为“弄”本身的虚化意义以及它在话语中展示的句法特征符合及物属性的和谐律,这些特征明显地体现在互动性强的口语体中。我们的研究表明,用语料库驱动的指导思想扩大考察动词用法的范围是十分必要的。具体来说,对动词和相关

的句法语义现象的研究不能只限于典型的论元结构的描写,需要借助于语体和语料库进行全面定量和定性的考察,并从语用功能的角度加以解释。

参考文献

- Biber, D. 1988. *Variation across Speech and Writing* [M]. Cambridge: CUP.
- Chafe, W. & J. Danielewicz. 1987. Properties of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A]. In R. Horowitz & S. Samuels (eds.). *Comprehending Oral and Written Language*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83-113.
- Hopper, P. & S. Thompson.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J]. *Language* 56: 251-299.
- Jing-Schmidt, Z. 2008. The manifestation of emotion: On the Mandarin Chinese *nandao*-interrogation [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6: 211-234.
- Lin, J. 2014. Light verbs [A]. In C.-T. Huang, Y.-H. Li & A. Simpson (eds.).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C].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73-99.
- Lyons, J. 1981. *Language, Meaning and Context* [M]. London: Fontana Press.
- Tao, H. Y. 1996. *Units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Prosody, Discourse, and Grammar*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Tao, H. Y. & S. Thompson. 1994. The discourse and grammar interface: The preferred clause structure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al discourse [J].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29: 1-34.
- Thompson, S. & P. Hopper. 2001. Transitivity, clause structure, and argument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conversation [A]. In J. Bybee & P. Hopper (eds.). *Frequ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Linguistic Structur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7-60.
-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研究所(编), 1986,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Z].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刁晏斌, 2004, 《现代汉语虚义动词研究》[M].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 陶红印, 1999, 试论语体分类的语法学意义 [J], 《当代语言学》(3): 15-24。
- 陶红印、刘娅琼, 2010a, 从语体差异到语法差异(上)——以自然会话与影视对白中的把字句、被动结构、光杆动词句、否定反问句为例 [J], 《当代修辞学》(1): 37-44。
- 陶红印、刘娅琼, 2010b, 从语体差异到语法差异(下)——以自然会话与影视对白中的把字句、被动结构、光杆动词句、否定反问句为例 [J], 《当代修辞学》(2): 22-27。
- 铁艳凤, 2010, 泛义动词“弄”的探析——兼与“搞、干、做”的对比研究 [D]。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
- 朱行帆, 2005, 轻动词和汉语低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 [J], 《现代外语》(3): 221-231。

收稿日期: 2016-06-20; 修改稿, 2016-12-07

通讯地址: 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90 Royce Hal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A 90095-1540, USA

A corpus-based study of low transitivity features of the verb *nong* in Chinese (p. 64)

HU Junfei & TAO Hongyin (Dep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90 Royce Hal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A 90095-1540, USA)

This paper uses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discourse register (i.e., spontaneous conversation, media dialog, and written Chinese) to investigate the transitivity features of the common verb *nong* in Chinese. Our findings show that low transitivity in the sense of Hopper and Thompson (1980) is prominent in discourse. We use the concept of subjectivity to explain the findings, arguing that simply treating *nong* as a substitute of an otherwise highly transitive verb is not supported by our empirical data.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appeal to corpora for linguistic evidence.

A corpus-based discourse study of Chinese medicine in UK national newspapers (p.73)

QIAN Yufang (Research Centre for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s, Zhe 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Tony MCENERY (Dept. of Linguistics and English Language, Lancaster University, LA1 4YT, UK)

With the increasing focus on personal health, the media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health issues. The media has the power to set agendas to create both public awareness and concern. The discourses they construct influence the shape of public opinion. This study merges corpus analysis and discourse studies to explore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around Chinese medicine in British newspapers, and has found that the agenda surrou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et in British national newspaper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imparting knowledge of, influencing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and shaping public opin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symmetric acquisition of intransitive verbs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p. 85)

ZHU Xiujie & WANG Tongsh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asymmetric acquisition of intransitive verbs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based on the acceptability judgment task.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EFL learners perform better on verbs of existence and location than verbs of change of state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performance on unaccusative verbs and unergative verbs. Semantic prominence and derivation complexity of construction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ir asymmetric acquisition, but syntactic complexity and proficiency levels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it.

On the inhibiting factors i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converted count/mass use (p. 98)

ZHANG Xiaopeng & DONG Xiao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Beifang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Yinchuan 750021, China)

This study, in the framework of usage-based linguistics,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entrenchment, preemption and nouns' individuation on L2 acquisition of English converted count/ mass use. Participants were Chinese third-yea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irst-yea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ird-yea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rated the acceptability of count nouns, mass nouns, converted count use, and converted mass us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frequency of count nouns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participants' acceptability of converted mass use, and the semantic similarity between count nouns and converted mass use gradually inhibits the acceptability of converted mass use as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improves; 2) the frequency of mass nouns and the extent of nouns' individuation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participants' acceptability of converted count use, and the semantic similarity